

小说界文库
旅外作家
短篇小说家

d i s a n z h o n g y u w a n g
d i s a n z h o n g y u w a n g
d i s a n z h o n g y u w a n g
d i s a n z h o n g y u w a n g

第三种

欲望

向精神分析

戴 舫 著

医生雪尔·罗宾逊叙述童年往事



戴舫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旅外作家
长篇小说
系列

d i s a n z h o n g y u w a n g

第三种欲望

向精神分析医生雪尔·罗宾逊叙述童年往事

戴 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左 泥

封面设计：袁银昌

廿

第三种欲望

——向精神分析医生雪尔·罗宾逊叙述童年往事

戴 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767-7/I·1431 定价：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引 子

我从校长手里接过那张通常叫做“博士证书”的薄纸卷，眼前便浮起那片久违的枯叶。那一刻我悟出了这片树叶的意义。它是一个隐喻。我仰起头，日正中天，黑袍下的身子十分暖和。我转过身跟其他人一起把方帽抛向空中，不过在它落下时没有伸手去接。我走下主席台台阶时看见那片树叶飘飘而去，一种宿命感令我隐隐兴奋起来。我已好久没有享受猜测幻觉幻象的愉悦了。那天毕业典礼后据说会场上遗落了满地方帽，许多男孩受雇去捡，捡完后便戴着方帽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到处乱转。

当晚朋友们照例聚会，一杯啤酒醉得我不省人事，第二天早起头疼得要炸裂。一疼就疼得没完没了，而且疼的部位也稀奇古怪，是在脑后左下方，脉搏般一鼓一鼓，呈放射状延伸及大脑各部。第五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那个短须剪得分整齐医生四十来岁，一听我的情况就断言是抑郁所致。我立即怀疑这医生想打发我，争辩说我绝无理由抑郁不乐，我刚拿到博士学位，正与辉煌前程抛媚眼调情。医生苦笑了一下，这令我感到自己犯了个可笑的错误。大概所有人拿了博士学位都会抑郁一

下。那医生正在喝咖啡，便让护士小姐也给我倒一杯。他拿着杯子站起来，走到窗前眺望远山青翠。时值五月，莺飞草长，春光正浓，院里梨花开成一片香雪海。他指着花问我：你有没有摘一枝闻闻？我嗤一声笑道：坐在这儿也闻得头昏脑胀，何必去摘？医生便阴谋得逞似地笑得十分灿然。我因不知自己做下什么蠢事而渐渐愤怒起来。他金黄的唇须因裂口而笑便蠕动起来，好像可以整个儿一起揪下。

医生回到桌边，居高临下俯视着问：你近来脑子里常出现哪个词语？我想了一下，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便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没劲。医生便又意味深长地笑，说：你已经回答了。他坐下，扯出一张白纸笺，龙飞凤舞写了一通，把我转到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那儿。这医生是个女人，叫雪尔·罗宾逊。这医生的性别十分要紧，直接关系到我在下面几个疗程中给她追述往事的性质和方法。

见她之前那几天我一直情绪亢奋，左脑后的疼痛部位便一鼓一鼓越发厉害，感觉像是青蛙鸣叫时鼓满气体的嘴。她的诊所设在一所公寓楼里，进门时穿着将军般制服的门卫把我领到五六步外的电梯边，我便给他一个美元。

雪尔握手刚劲有力像个男人。

我是 Dr.雪尔·罗宾逊。欢迎。

她没有加一句“你可以叫我雪尔，”看来是个希望人把她当回事的女人，大概不喜欢病人跟她套近乎。她个子偏高，穿一身男人似的深灰西服，还系一条细细的领带，色彩图案热烈到近于猥亵的那种。不看她脑袋她像个有女性乳房发育症的男人。她头发金红，剪得短而干净。

雪尔坐在一张巨大的书桌后面，翻着我的病历。我很奇怪

我在她这儿的病历怎么会有这么厚一叠。

你最近都做些什么？她问。

我最近什么也没做。论文没按时寄给出版社。计划多时的钓鱼假期在家中度过。这儿站站，那儿站站，看着窗外的树叶从小圆片片逐渐肥厚如掌。什么也没做。没劲。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她显出十分关注的神态，很令我感动。后来发现她对一切都那样关注，就像鱼贩子关注他地摊上每一条未售出的小鱼。

说一些你觉得有劲的事吧，她说。

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一桩有劲的事。跟大脑袋如生口颅症的教授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前沿概念曾对我充满诱惑，现在却像一堆吃完的橘子皮堆在记忆的角落。微风吹进书房案头堆积如山的论文书稿便灰尘轻飏。

说些带劲的事。现在的没有，以前的也行。

雪尔是个医生，有一个医学博士还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哲学博士衔头。她假定我生活中曾有过带劲的事并对此充满信心。这种逻辑的力量迫使我想起了几桩事。我在描述我第一次做爱过程时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接着我听到雪尔压抑着呼出一口长气。她一定也想打哈欠，却又不好意思原样打出来。这时我已躺在病人的躺椅上，她坐在我脑后视线不及之处。我听到她在后面摆弄咖啡壶的声音，接着一股咖啡的浓香袭来，闻得出是爱尔兰奶油咖啡。我从躺椅上坐起，向她要了一杯，与她面对面对啜。咖啡滚烫，苦香味直沁肺腑。雪尔边喝边不时闭一下眼睛。这时已是星期五下午四点，还有一个小时她便可以撇下一周辛劳享受周末。也许此刻她正在想象枝形吊灯下的家庭晚宴或与男人或情人开车去野外约会。我忽然有些谦意，用自己没

劲的生活去搅混他人生机勃勃的日子。

今晚有约会吗？我问。雪尔倚在椅背上的身子微微一直，吃惊地看着我。我又问：你结婚了？有孩子？雪尔用手指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用种略带嘲讽又不失礼貌的语调提醒我是她的病人而不是相反。我发觉她的乳房相当丰满却被那件男人似的西装压得圆而平。你为什么不穿裙子？配一个带托的乳罩，你的胸脯足可杀死任何男人。雪尔脸色透出愠怒，继而又平静下来，用那种精神分析医生特有的平稳语调问我第一次做爱时是否像刚才叙述的那么毫无激情。她的故作镇静使我有有机可乘。雪尔，你这一身男人的衣服只会使有同性恋倾向的男人想入非非。雪尔继续着她医生的问话：你是否受过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直视着雪尔的眼睛：我想请你去吃饭。雪尔掉开眼睛，继续转动手中的咖啡杯：把那创伤揭开来，对你健康有利。我说：今晚我有空，六点半来接你怎么样？雪尔用左手拨了拨我的病历：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不对？雪尔显示的对中国的知识并未引起我的惊异。我继续问：你喜不喜欢中国菜？我在第七街那儿发现……雪尔打断我说：你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听说文革中红卫兵专门迫害你父母那样的人，那你的童年一定非常悲惨。你有没有挨过打……

我想一定有神经短路这回事。童年这两个字使我逻辑地转动着的大脑一下子处于停顿状态。雪尔继续着她医生的话题，好像在讲述她从郑念那本在美国畅销很久的《上海生与死》中念来的故事。雪尔那一身男人似的西服由深灰色渐渐变淡，变白，一种炽热的白。从这白色中现出一道高墙。墙很高，是防人超越而入的。墙变得清晰起来，红砖之间的灰泥缝也已明白可辨。墙根下长着草，狗尾巴草，顶着细毛茸茸的脑袋在风中优美地鞠

躬。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向墙根走去，他黑发覆额，眼白蓝莹莹的，眼神羞怯，垂在裤侧的右手食指不停在空中画着什么。他用手拍着墙，墙那边的世界对他有无限诱惑，但却遥不可及。他转过大大的脑袋望着四周，发现没人便开始喃喃自语，并作出各种表情，有时温柔，有时暴戾，大概跟他幻想着的情景有关。他在墙根逡巡良久，拔了一根狗尾草在月上东山时离去……

你别激动，雪尔继续说着，童年的心灵创伤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常常要到中年后才体现出来……

那墙越来越清晰，显出红砖上孩子们涂画的各种字样。一个光头的小男孩出现了，十二三岁，脸上有许多打架留下的疤痕。他走路时咬牙切齿，眼睛四下乱转。他的眼珠像一颗黄玻璃球，冷冰冰不带感情。他走到墙边，又往后退了十来步，突然弓腰箭一般向墙射去。到了墙边，一只脚在墙上一点，身子一跃，两只手攀住墙顶粗糙的水泥面，接着整个身子重重撞在墙上发出蓬地一响。他两臂一用力，身子便蹿了上去。他站在墙上，左右望望，拍拍手上的灰尘插入裤袋，在墙上走来走去。他身边突然多出了五个光头的男孩，在墙上站成一排，向墙里望着。夕阳照在他们背上，把影子投射出很远很远。他们站着，突然一起拉开裤子，骄傲地向空中射出六道闪亮的弧线。红砖墙在夕阳照耀下愈发浓艳……

医生的声音像一匹由远驰近的马，蹄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激越。

你慢慢回忆，把它的破坏能量逐渐释放出来，你的抑郁症状半年内便可……

我笑起来。我的笑可能有些怪，因为我嘴一裂开，她的眼睛便瞪得滚圆。她的眼睛是栗色的，有一种暖色调。

医生，我想起带劲的事来了，我的童年。

她审视着我，猜测我是否有嘲弄她的职业的恶意。我想我舒心的笑使她难以证实她的怀疑。她的语调带上一丝谦意。

对不起，你的童年原来很幸福，我以为……

我说我的童年很带劲。

她变得谨慎起来，微微吸了几下鼻子，像一头设法从陷阱中猎取诱饵而又不致陷入的母豹。她的女人气息从那套男人的西服中弥漫出来，这激起了我的兴趣。

那你是说，你的童年虽不幸福，却很带劲？

我笑而不答。不幸的人都一样不幸，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谁知道各人的标准是什么？

她又倒了杯咖啡。从她慢慢啜饮的动作上我看出她对我已产生兴趣，便得寸进尺请她允许我抽烟。她眉毛吃惊地扬起，好像我刚才建议要强奸她。在美国专业人士中抽烟已成为一种恶习，一种低人一等的标志，一种失败者的象征，因为抽烟者缺乏抗拒罪恶诱惑的意志力。

雪尔的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我紧盯着她，她流露出愠怒反感，摇摇头。我掏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缓缓向她坐的方向喷出，含笑望着她。我想那一刻她不知该怎么办。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无赖是一种不谐和体。她既不能期望我像博士一样服从礼仪，也不能把我当无赖赶将出去，左右权衡她最后决定把我当作无赖。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她说。我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她先是愤怒继而鄙夷再接着便有些不自在，最后一种表情是恐惧，大概以为我精神病发作起来了。我止住笑，换上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常在学术会议上见到的那种。

把我赶走这个处理方法，我真不敢恭维。我以为你聪明得多。

我可以体会到她心里的不自信，所以我住口不言等她发问。但我低估了她。她一个劲儿喝咖啡看表，似乎以这种暗示催我快走。我别无选择。

我问你是否可以抽烟，正是为了违反你的抽烟禁令。难道你看不出？

这种顽童式的恶作剧，看不出又怎么样？

她说出这话就后悔了。我故作宽容。她体会到我的恶意，尖细的鼻子从鼻尖上红润起来。

顽童的恶作剧，带不带劲？我的言外之意是：你既要我说些带劲的事，而我用这么明显的隐喻方式告诉你，作为专读人类行为隐喻的心理分析医生竟然不识，岂不令人笑掉大牙！但我并不期待她认输。

对不起，我只把躺在那把躺椅上的人作为病人。

我露出牙齿笑，笑出那么多恶意和快乐。这种恶意和快乐已经离开我多年，这也许就是造成我头疼的根本原因。

我们友好地分了手。下一次去她已订出一份详细的诊疗策略，一张纸上一列几十个问题，都与我童年有关。她认为只要把我的童年生活清理一遍，我就会恢复心理健康，头疼也会随之消失。

我曾修过多门关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班课程，对他们的智慧和恶意我由衷敬佩。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把人类的一切崇高伟大美丽善良都论说净尽，除了恶意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一个哲人的眼光？但我对这些弗洛伊德、荣格的徒子徒孙们治病的本事却毫无信心。他们谈话机智幽默妙趣横生，与中国的算命先生谈起命相一样。不过我在决定买那一种股票前，还是要看《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上的专栏文章才做决定。说实话，拿

着雪尔精心炮制的那一大堆问题，我心中十分好笑。但既然医疗保险为我付钱，为什么不乘机与这女医生多聊几次天呢？这样水准的谈话对手，毕竟也不容易找，而且谈的都是关于我。这世界人人忙碌，花钱也难雇人专门听你大谈自己，还得义务保密，不管你说些什么。更主要的是，这第二次访问时，雪尔穿着条浅红长裙，显出她十分漂亮的乳房。跟这样一个女人谈话无疑是种享受。

我表示同意进行治疗时，她提出一个条件，要我不再跟她玩男人的那种“权力游戏”。我口头答应，心下颇不以为然。如果我们之间真存在某种权力关系，不游戏一下难道还通过战争来解决？

那以后的一年里，我们进行了三个疗程。我躺在躺椅上，她坐在后面。她问我答，叙述，回忆，分析评论，她用录音机录下。治疗的主要手段便是谈话，她的技巧确实使我记起许多似乎遗忘了的东西，又创造了许多我今后也会叫做记忆的东西。我曾多次发现自己对某些事件的记忆突然在某一关键时刻中断，这时雪尔便会对我施行催眠术，让我在催眠状态下与她谈话。这样做的目的是绕过我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机制，将我下意识中见不得人的东西骗出来鞭尸。这方法似乎的确让我忆起一些不快的事件，但由于我学过心理分析学老祖宗的东西，这个方法便不那么有效，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我在谈话中会突然由英文改说中文，因为雪尔不懂中文。当我听着这些中文片断，觉得部分涉及隐私，另一些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用释梦法处理后勉强有点意思，但当中常有明显的生编乱造或时间错位。有些关于我童年的事，却掺有我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所以我很不相信这些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对写这本书就如胡椒粉之于阳春面一般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非对那些录音的机械录用，而是用中国传统笔法，将真事隐去，又假语村言，以证明作者出洋墨水缸而不污国粹本色，正如黄肤黑发受之父母，五千年历史打骂不走云云。

此书虽属回忆录性质，但因创造太多，是一本虚构的回忆录。如果回忆之事与他人相似，也只能怪老子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者，草扎之狗也。人扎刍狗时扎得大同小异，所以亦无须怪天地不仁将人都造成一个模样儿。刍狗是祭祖宗用的东西，用完就随地乱撒，烧火填坑都行。人大概也是天地造来祭什么用的，祭完便往地球上一撒，于是便有人模狗样许多悲喜剧。那时天地大概正在巨室高堂之上煦煦然睡矣。

顺便说一下，我的头疼后来查出是眼压高低不平衡所致，在一座什么仪器下躺过三次就好了。现在正汲汲营生，酒足饭饱之余，便吐纳呼吸，学孟夫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衣食足而知礼义云尔。

(1)

星期天早上我照例被大兵的电话吵醒，拿起听筒前我猜了一回他第一句话是“他妈的又丢了一千块”还是“嗨，老子运要转了。”大兵在纽约的一个中资机构工作，月薪只有千把块，可是每个周末去大西洋赌城的赌派像是个百万富翁。这当中的秘密他自然没告诉我。

嗨，小弟，你猜我昨晚碰到谁了？

大兵语调得意洋洋。他碰见的人一定非同一般，不然他不会舍赌经而先谈这事。我猜了一通都不对，大兵便更得意了。

梅戈尔！我碰见梅戈尔了，你猜不着吧！

梅戈尔？我重复了一句。

你总不会记不得梅戈尔了吧！大兵在电话里大声叫嚷。小时候我们吵架，总要骂你：梅戈尔是戴舫的小媳妇儿，多来米来多拉多。

大兵在电话里唱了起来。自然，我不会忘了我曾有过一个小媳妇。文革中有近两年的时间，我跟她每晚面对面打地铺睡在一间房子里。

大兵说他是在轮盘赌那儿碰到她的。他看见一个英国佬后面站着个穿黑色夜礼服的亚洲女人，觉得眼熟，但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在他福来运转赢回几百块钱时，想起她是我们幼年的相识。他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她用一种困惑的眼光望着身高一米九〇的大兵，问：我们见过面吗？大兵说到这里不无感慨地骂了一句：这个小娘们儿还是他妈的那么不认人。大兵后来请她一块儿去酒吧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聊了聊幼年相识们的情况。她也问了我的现况，跟问别人一样礼貌周到。大兵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说：戴舫，你亏了。

我猜测着大兵的意思，没吱声。

那个小娘们儿，大兵接道，小时候也不见得漂亮，就一双狐狸眼睛妖媚得很，比起我的桃芳可差老鼻子了。可是现在，嗨，那个派，没折儿了。亚洲女人穿浅胸礼服最难看，为什么？没乳房，托不出那道沟沟儿来。可梅戈尔，嘻，那道沟看得我手直痒痒。再想起她那个英国佬，老得他妈的可以做她爹，却有那艳福。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所以我说，你扔了她，亏了。

我心里说，我又没扔她。她离开上海回香港时，胸脯还跟男孩子所差无几，我怎想得到会不会亏？不过我关心的不是这些。我问大兵梅戈尔戴什么项链配她的黑礼服。大兵楞了一会儿，

说记不清她戴什么项链，也许没戴，要是戴了珍珠或钻石项链，他决不会没印象。我说不可能，穿浅胸礼服不戴项链，脖子上光光的，以梅戈尔的趣味，决不会犯这种错误。大兵好久没吱声，最后叫了起来：对，她戴了，不是项练，而是个什么玉坠子，像个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土气极了。我忙问是什么样的玉坠子。大兵说他没细看，所以记得是个玉坠子，是因为他当时正告诉她我的情况。他说我在念博士，穷得叮咣响。梅戈尔便问大兵我是否结婚。大兵说结了又离了，现在一个人带个七岁的女儿，刁蛮古怪，也长一对狐狸眼。据大兵说，听到这里，梅戈尔便用手抓着胸前的玉坠子。那坠子是用一根绿丝绦栓着挂在脖子上的。梅戈尔抓着那个坠子，口中还喃喃自语：我想得到。我想得到。我问大兵可看清那个坠子的模样儿。大兵说他后来溜了一眼那个坠子，是个不圆不方不扁不长不成形状的东西，就是碧绿透明。其它无甚值得一提。我又问大兵，那坠子里面可有鱼。我才问出这话就后悔了。不等大兵反问，便解释说我怀疑那个坠子是我祖传的碧玉避邪。我没有告诉他的是，这个避邪我曾给了梅戈尔后来又要了回来。自从这个避邪失踪，我便一直怀疑是梅戈尔不告自取，现在看来，这个避邪的确在她那儿，而且变得纯净透明，里面一条鱼也没有了。

大兵说和梅戈尔分手时并未留下地址电话。我知道她不想再跟我有何关系。

我仔细看了我女儿。她的确长着一对跟梅戈尔十分相像的狐狸眼睛。

雪尔的问题上有一栏题作“性觉醒”。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那个著名的“原始之景”，你有没有半夜推开父母卧室的门，发现

他们正在打架？我的“原始之景”，是一九六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上海火车站站台上飘着一大团一大团蓝色的雾幔。这些雾不知从何处飘来，一团团滚过列车车顶，袭入站台，迅速吞没了人和柱子，又慢慢吐出来。它们忽高忽低忽紧忽慢地飘着，悠闲地玩弄着所遇见的一切物事。一团雾气在我们头上聚集，像个大圆球在站台棚顶下轻轻颤动。那圆球缓缓压下来，刹那间裹住了我们和座下的长椅。我觉得椅子船似地摇晃起来，一切都失了重心变得新奇而又令人害怕。然后我看见雾幔里显出林阿姨波浪起伏的长发，她的脸。她眼睛含笑看着我，大概看我害不害怕。我这时发觉自己一只手紧紧抓着林阿姨的袖子，手心湿津津的。

那个雾球砸过我们以后变扁了，从我们椅下飘走。这样的雾我以后在黄山顶上西海见过，在旧金山沿海的 101 公路上也见过，但从没在上海见过。上海的雾是冬天才有的，笼罩一切渗透一切但却不会烟一般飘动。那一天我睁大眼睛追逐着那些雾幔，心里想象着梅戈尔从雾裹着的车厢里走出来的情形。

梅戈尔是七岁才从香港她祖父母处来上海的。五八年她父母在美国念完书，把她留在香港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林阿姨是上海合唱团的女中音。林叔叔分配到我父亲所在的海军舰艇研究所工作。我父亲曾说林叔叔是他们研究所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却不知为何在我父亲手下。林叔叔整天板着脸，住在我们楼上却从不来我家玩。我父亲也从不上去。林阿姨却是个快乐漂亮的女人，她刚搬来第二天就跟我母亲成了好朋友，随即又把我 and 梅戈尔变成了娃娃夫妻。她们当然不是包办婚姻，但很显然她们都喜欢这个游戏。我叫林阿姨“林妈妈”，并从我的媳妇那儿接受了无数礼物，包括许多照片，背后写着些甜言蜜语，署着梅戈尔的名却是林阿姨的笔迹。我母亲也以同样的方

式送了礼物照片给远在香港的梅戈尔。

火车又误点了。林阿姨和妈妈给我买了糕点，意在防止我沉入睡乡。但真正防止我睡着的，却是那大团大团的蓝色雾幔，看着它们无休止地飘动我兴味无穷。林阿姨和妈妈讲着研究所宿舍楼里的各种趣事，埋怨她们的丈夫老是一去实验基地就半年八月不回来。我想要是林叔叔在家，林阿姨就不会带我来接梅戈尔了。

我大约在五六岁时体会到了有个小媳妇的利弊。看着照片上那个细细瘦瘦，长着尖鼻子尖下巴的小女孩，想到千里之外有一个小姑娘跟我有这么一层关系，心里十分受用，因为别的孩子都没有。但一与别的孩子发生争执，他们只消说：嗨，你有个小媳妇，我便立即哑口无言，逃回家中。我曾经质疑为什么有个小媳妇就得逃走，有几次我甚至反问道：有个小媳妇有什么不好？你还没有呢。但所有的孩子都对此嗤之以鼻，于是我终究只有落荒而逃一条路。这些羞辱我当然归罪于林阿姨。林阿姨是我们那块地方唯一穿高跟鞋烫长波浪并涂脂抹粉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她这样做还勉强被接受，大约因为她是艺术家的特殊身份。但孩子们看她打扮像电影里的女特务或资本家太太，便给她取了个“女妖怪”的绰号，在她家没人时便往她房子的玻璃窗上扔“烂泥弹”。

火车已经误点两个多小时了。在站台上的长椅上坐久了便觉得夜凉如水。我微微一蜷缩林阿姨就发现了。她敞开薄呢外套要把我裹进怀里。我不好意思地撑着。林阿姨故作吃惊地说：嗨，我的小女婿还没见到我女儿就跟丈母娘不亲热了。她最终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的面颊在我头发上摩娑着。她的怀里十分温暖。